

学术研究

第一〇九期

许多奇谈怪论，人们大可借此打开眼界。

奇谈怪论之一是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广大农民的利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土地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割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这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屈的好官的拥护了。”

按照吴晗同志的“看法”，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他们“向往”的，只是“比较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他们所能采取的办法，只是“拥护”一些“清官”，请求“清官”替他们“减轻”一些“负担”，“伸雪”一些“冤枉”，如此等等。除此而外，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向往”了！在封建地主阶级奴役压迫之下，广大人民是否“向往”革命斗争呢？在这篇《自我批评》历史观有正面回答，但实际上却是反复说明了。

他说：“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说，在吴晗同志看来，一般的地主与农民是沒有矛盾的，农民对他们也不作斗争的，只有那些乡官，才与农民有矛盾，农民才与他们作斗争。这是一种有点荒唐的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吴晗同志既然取得了这个根本的矛盾，那还有什么阶级矛盾，革命斗争问题呢？

那末，农民又是怎样同乡官作斗争的呢？吴晗同志说：“告状”就是农民的一种特殊形式”。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洪阿二一家虽有代天仇冤，但始终所想到的是复仇办法，只是“告状”“告状”，别无其他“向往”，而“告状”要能获胜，又非要“清官”出场帮忙不可了。在吴晗同志的“理论”和《海瑞罢官》这个作品中，好象的确有这样的现象。

※※※

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时汉人

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那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习上犯起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字很长，内容很繁，概括言之，它的基本精神是我自我辩护，包含着有反批评的成分，同时也有承认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些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作深入的批判，但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不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本来是再自然的事。但他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实则以很大的力作作自我辩护、洗白和澄清，言不副实，文不对题，无怪乎有些同志气愤了。

最近，各报发表了不少对《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有理由、有根据，我们是同意的，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这里谈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吴晗同志写海瑞，歌颂海瑞的动机是复杂的、真实的，具体的动机何在？他内心是怎样想的？有些同志很乐意去洞悉这一点。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说：“自己立场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回答可能不能满足各同志的要求。他们指责吴晗言辞装模作样，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供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怎样配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究竟根据什么呢？无它，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然后根据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是那个或那个，是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是的，我们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我们对主观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既要同唯心论者划清界限，又要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时候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是否好。

通过剧本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宣扬了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表现了吴晗同志错误的道德观、历史观等等，对退田、除弊、平冤狱和海瑞的“做官”的描写，在当时起了某种程度的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这就是可以说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事实上，吴晗同志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往下再追迫他的主观意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密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了这个或那个动机。《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一定是号召人们“退田”、“平冤狱”，搞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样说，看起来倒也合乎逻辑，方便简单，动机和效果绝对统一起来了。但这样简单、一般地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唯物论者看重的作法。把问题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在文学史上有所谓客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对生活现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客观进行了伟大的艺术超越，但他的主观意图，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

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十卷，第六八六页）。这不是说狄更斯等如何比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多少，而是说狄更斯和狄更斯都认识到了，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在再现现实生活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获得了较大的客观意义，可以说是非作者主观之所及的。同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决没有表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揭露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主观意图，因为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今天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读者能从其中得出什么，认为《红楼梦》的哲学思想真有一条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很显然，他们不能说出这个客观效果，曹雪芹一定没有这个动机。文学作品形成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很复杂的，具有偶然性的，靠主观愿望的思想、用语言表达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等等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者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根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

那么这样说，对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否就可以知了呢？不，一方面固然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那是服脱罪不了吴晗同志，也无法使读者心悅诚服的。总之，对这样关系重大而特别需要慎重的问题，批评者是不宜太武断的。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学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学术必然要隶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分析学术问题的客观实际的理论根据。这个道理吴晗同志是有些懂的，他没有认为《海瑞罢官》只是学术问题，而承认它在政治上客观效果是恶毒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吴晗同志说：“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人可以有反动到政治上的学术思想，而两种阶级立场，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但从全文看，吴晗同志所表达的思想多少可以概括及，即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但由于世事没有得到很彻底的改造，思想深处还保留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由学术问题上升了政治性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提法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根据，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一个学术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也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精通，或者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所致，而且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水平，与当时时

为什么坚持这个“看法”？

——评吴晗同志《自我批评》里对清官的认识

余心泽

提要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坚持他对清官的看法一贯正确。他认为在封建官僚的压迫下劳动人民“向往”的是“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他们与地主阶级是没有矛盾的，只有与“乡官”的矛盾。他们的阶级斗争形式是“告状”。这是根本否定了封建社会里的阶级斗争。

他认为清官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们仍是人民的“青天”。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

他在狂热地宣扬了“清官”海瑞是“站在农民和市民立场上”的理论以后，又说“决不可以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政治家”。这是玩弄欺蒙伎俩，企图掩盖自己的错误观点。

他坚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观点，这是公然宣扬阶级调和论，鼓吹阶级合作。

归根结底，吴晗同志坚持这些错误观点，目的是为他的《海瑞罢官》辩护，拒绝批评。

“清官”，他虽然也是封建官僚的一员，但在农民和乡官的“阶级斗争”（告状）中，却能站在农民一边，减轻农民的负担，伸雪农民的冤屈。既然有这样的“清官”、“好官”，不言而喻，广大人民又何必“向往”革命斗争呢！

吴晗同志抹杀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创造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奇妙方案，这就无怪乎他在其它的文章中，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向封建革命要深恶痛绝。他说：“要强调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就必须相对地刻划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才行”，对封建社会“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的罪恶描写得很少，于是，历史的光明面丧失了，写在书上的正是这个黑暗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吴晗同志在这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点和阶级感情。他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是那样的慷慨，而对历史上的那些帝王将相，“清官”和“好皇帝”则是那样的深恶。

我认为吴晗同志这一点坦白性，是应该肯定的。的确，在今天，谁有这样的勇气，“敢”为早已被埋葬了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平”呢？谁“敢”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帝王将相公然作为是历史的“光明面”，而把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充称为“漆黑一团”呢？看来，吴晗同志确实太“勇敢”的一派！他不仅“敢”于这样说，吴“于”这样说，而且到现在还“敢”于这样坚持。可惜的是，他所坚持的不是正确的东西，而是“不分阶级的派性”。

奇谈怪论之二是说：“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屈的……好官，人民作了慈悲，叫作‘青天’”……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点上，他们也是封建官僚一样，是人民对立的。”

吴晗同志的这一段话，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说，历史上人民对“好官”的“鉴定”是缺乏阶级分析的，我们应该坚持阶级观点。但实际上，吴晗同志的意思并非如此。第一，吴晗同志在许多地方反复说明历史上人民把某些“清官”叫做“青天”的“理论”和《海瑞罢官》这个作品中，好象的确有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为了否定这种说法，对这种现象作认真的

阶级分析；相反，却是为了反复地肯定它。第二，吴晗同志自己也是把这些“清官”叫作“青天”的。就在《况钟与周忱》这篇文章里，他还专门作了《况青天》这一节，并说：“苏州人民好容易有了一个青天，松了一口气”等等。因为在吴晗同志看来，劳动人民根本不“向往”革命，只“向往”“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只配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那末，既然出现了这样的“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好官”的“清官”，既然承认他们对劳动人民“宽恕了一下，劳动人民怎么不可以对他们‘感恩戴德’呢？怎么能喊不出‘青天大老爷公僕万代’”，也就是“清官万岁”的口号呢？

不错，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现象，即劳动人民对“清官”存在着幻想，把他们叫作“青天”。这是劳动人民长期以来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受了封建意识影响毒害的结果。那末，自诩站稳了阶级立场的吴晗同志，在今天就不应该狂热地宣扬“清官”，宣扬“青天”的崇拜了。可是恰恰相反，他对况钟和周忱备加赞扬，认为他们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他对海瑞，则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歌颂他是农民的“救星”，说他“公僕万代”！万幸生来把曹孟德！吴晗同志对这些“清官”的评价，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代替它的，是十足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吴晗同志这样宣扬“清官”究竟起了“欺骗”呢？还是起了欺骗呢？自称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吴晗同志，这是受了“欺骗”是没有人相信的。那末，剩下的也只能是为了欺骗了。不管是否“受了”那是“为了”，总之，它继续在人们对它欺取崇拜，这是可以肯定的。

吴晗同志说：“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政治家”。但是，究竟是谁“得出”这样“结论”的呢？难道不是他自己吗？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在《论海瑞》里说：“清官”海瑞是“深深得到农民人民爱戴的、言行一致的政治家。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被欺，被冤屈在农

民一边。海知县、海瑞堂当时被打官司，被欺、被冤屈在农民一边。海知县、海瑞堂当时被打官司，被欺、被冤屈在农民一边。海知县、海瑞堂当时被打官司，被欺、被冤屈在农民一边。

级斗争形势发生的泛滥于整个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思潮都有关系。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又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对待对待马

克思主义的态来考虑，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人，是比划数略马克思主义”并且站到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多数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练。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吹草动就左右摇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同时由于对不熟悉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在学术问题上犯错误的也是存在的。有人上边去便会上边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这个说法——就是吴晗同志说这一点了，就是承认学术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政治问题。但是，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就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按这个逻辑推广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

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过这些错误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待社会主义心、怀不诚，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以反说证法成立的真实历史情况有多少呢？光是吴晗同志前几篇学术问题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就能够使人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吗？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反动，需要考察他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的全部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工作情况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根据某根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已经造成某种僵局，而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对自己过去几年中所所作的反动性很肯定，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另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的政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治立场是反动的，其政

